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

· 2014 年上海妇女理论研究成果汇编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2014年上海妇女理论研究成果汇编/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280-2

I. ①妇... II. ①上... III. ①妇女工作-理论研究-文集 IV. ①D4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211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陈蔡
封面装帧 克里斯

出品

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2014年上海妇女理论研究成果汇编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320,000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280-2/D·2487
定价 78.00 元

编委会名单

主任：焦扬 徐枫

副主任：朱鸣 黎荣 翁文磊 孙美娥 刘琪

委员：田熊 孙红岩 余伟星 宋秀秀 李苏华 李艳玲
陈建军 竺倩伟 顾秀娟 葛影敏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编：徐枫

副主编：黎荣

执行编辑：李苏华

统稿：沈洁 凌慧 岑华 朱亮佳

目录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全球化、城镇化与新城市女性梦想...003

海外归国人才就业状况及性别差异分析——基于 2011 年上海市侨情调查...009

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女性创意人才的开发研究...019

打造职业女性美丽心灵的通道——现代职业女性心理援助之调研报告...028

法治思维视域中女检察官成长与成才的实证研究——以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为例...035

虹口区职业女性非学历短期培训需求调研报告...045

朋辈互助在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的运用...056

当代女大学生的求职困惑与对策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063

上海市金山区城乡家庭发展状况研究...073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司法保护现状管窥——以黄浦区人民法院 2010~2012 年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为切入点...083

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中社会观护制度研究...090

加强对焦虑抑郁儿童青少年的关注与疏导——从一则小学生重症抑郁实例谈起...099

杨浦区高龄独居(空巢)老年女性群体生命安全需求研究...105

H 城区女性吸毒相关因素研究...113

服务婚姻家庭多元需求

青年白领子女养育的行为、态度与压力——来自上海的最新调查报告...123

杨浦区家政服务供求主体行为调查研究...142

女大学生情感认知教育的实践探索——基于对“90后”女大学生恋爱观的调查...150

上海出版业适龄青年编辑婚恋情况调研报告...156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大教育格局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徐汇区家长学校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思考...163

功能缺失型家庭的亲职压力现状调查与反思...173

闵行区失独家庭基本情况的调研报告...189

特殊儿童家庭艺术治疗现状与对策研究...195

论儿童蒙读物在家庭教育中的多重价值...210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现状及调研分析——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216

创新妇女组织与妇女工作

妇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路径与前景...227

上海巾帼志愿者课题调研报告 ...232

本市年轻女干部培养现状与路径研究...241

妇联携手社会组织共建责任社会之道...249

杨浦区妇女之家创新建设初探...257

创新妇女维权维稳工作 有效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闵行区白玉兰社工服务站为例...271

多元视角下妇联维权工作的路径选择——基于静安区妇联维权工作的实践与探索...277

后记...285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一、“新城市女性”概念

新城市女性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实现城乡身份转换的女性,类似于“新上海人”中“新”的概念,“新”表明在时间上是刚来的、刚到的,与户籍关系没有必然关联。新城市女性主要区别于原先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身份,新城市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将是今后新型城镇化研究中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

由于解放以后长期的城乡二元隔离,造成了农村女性在生活空间、社会活动领域内与城市女性的分离。除了在 60、70 年代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山运动中,约有 1700 多万人(约占当时 1/10 的城市人口)去到农村,其中近一半是城市女知青。这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也是建国后城市女性与农村女性的第一次交接,但在这场运动中,城市青年女性整体是被动的弱势群体,农村女性未能也不可能从中获得积极的影响。

二、农村女性迁徙的三个阶段

80 年代,国内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行,而 70 年代后期发端的全球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初露端倪,产业结构升级也扩散到中国。历史证明,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紧密而良好结合的发展契机。中国开始承接全球第三次制造业大转移,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农村深深卷入的应该说首先是这场全球化进程,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

* 黄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

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其次才是城镇化进程,不仅仅因为高速增长的经济给他们带来了貌似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物质收入,更重要的根源在于农村问题的无解。

人口自农村向城市的迁徙过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按照农村女性加入迁徙的时间和程度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90年),自80年代起,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转移,但是女性人口的转移整体滞后于男性,并且大多集中于年轻女性的流动。在第一阶段的人口流动中,女性只占中国农民工总体的30%左右。这也符合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有可能经过的“男工女耕”的过程:男性先转移到更优势的产业上去了,留守在家的女性填补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空缺。为了改善家庭收入,农村壮年男性大多外出打工。家里的农业种植、修房子、修灌溉渠、家庭事务、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工作全部由妇女承担。农村开始出现“空心化”现象,以妇孺老人留守村庄为主。这一阶段的迁徙特征正如地方政府口号宣传的,“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第二阶段(1990~2000年),在总量剧增的同时,流动人口的稳定性增强,家庭化迁移成为趋势。大量农村女性人口流入城市,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组成的不完整家庭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女性及其家庭大多聚居在城郊接合部,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较低、交通和生活设施相对便利、就业机会较多,她们在各类加工及批发交易市场、废旧物资交易市场等场所务工,也有相当数量从事保姆、月嫂等家政服务。

第三阶段(2000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10年有近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有8487万人出生于1980年以后,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费更高,对工作期望值也较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比上辈强烈。新生代农民工整体表现出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扎根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①。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上一代农民工有了极大的不同,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很难将他们与城市的“80后”、“90后”区别开来。但他们的就业流动性较大,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2007年出版的《打工女孩》虽然颇受争议,却多少反映了新一代打工妹的生存环境与她们的梦想,她们得到的最多,失去的也最多。

^① 孙铁翔:《流动人口管理之难如何化解?》新华网,2012年8月8日。

三、全球化中的新城市女性

由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背景,全球化与城镇化在国内许多城市中是同时进行的。当我们谈论全球经济一体化时,很多人可能并未清醒地意识到,农村女性多多少少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线。

在第一阶段的人口流动中,女性虽然只占中国农民工总体的30%左右,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广州和深圳等地,年轻女性却占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总数的80%以上^①。她们主要聚集在低技能、低报酬、工时长、劳动强度大的服务性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②。年轻女性主要流入南方沿海城市及其郊区,优先发展的广东一带是主要目的地。她们怀着梦想,希望通过打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时纺织、玩具制造以及以OEM为主的代工产业是广东的发展支柱,心细手快的打工妹远比笨手拙脚的打工仔吃香。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东莞数百万打工族中70%是女性。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轰动全国的《外来妹》充分反映了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妹的境遇。对成本的精确计算,让企业主们舍弃了昂贵而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设备,选择雇佣年轻、勤劳而工资低廉的中国女工从事手工劳动。

在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女性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叠合了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影响特征。在全球经济中,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构成了在电子和成衣行业中低端制造业劳动力的主体,也就是第二产业中的女性,她们是驯良的和低薪的劳动者。这在空间上反映为中国大都市郊区的连片工业园区,以及城郊外来人口的集中租住地和富士康式的职工集中生活区。

虽然她们工作的城市甚至算不上像样的城市,例如东莞本身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迅猛扩张的城市,在《打工女孩》的作者张彤禾的眼中,“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念碑,就是地标。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这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没有记忆,没有过去,这里集中了中国最极端的一切,无情、冰冷、坚硬、压力巨大、杂乱无章,又充满了生机”。但这部分女性仍可以归入“新城市女性”,因为她们从事的不再是第一产业部门的农业活动,而是第二产业部门的制造业。

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③。这

①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② 谭琳、卜文波:《中国在业人口职业、行业性别隔离状况及成因》,《妇女研究论丛》1995年第1期。

③ 辜胜阻:《农村劳动力供给格局或正向严重短缺转变》,经济参考网,2011年3月4日。

其中无法忽略来自这些新城市女性的贡献。

四、城镇化中的新城市女性

在第二阶段的人口流动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并且从南方沿海城市向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扩散,很多以家庭的形式迁徙。在这一时期的迁徙,农村女性更多表现为参与了城市化/城镇化进程。

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在大城市中,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了城市中日益增大的劳动力差异和职业的两极分化。制造业部门衰退,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行业;而服务业部门兴起,顶端与底端的服务岗位需求同时增长,顶端是管理和经营等服务业岗位,造就了全球化中城市女性白领群体的成长;底端是消费导向的服务业岗位,则由从制造业部门“下岗”的女性工人承担,更多地是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性群体承担。

一方面,新城市女性的出现为城市职业女性群体提供了服务需求。由于城市职业女性的工作时间大大地挤压了她们的业余时间,职业女性往往以周末超市购物代替传统的每日菜场采购,同时迎合她们家庭需求的服务产业蜂拥而来,快餐店和外卖场所、干洗店、超市、大型卖场、24小时便利店在城市中大量兴起。而这些城市街区空间往往也是新城市女性集中的就业场所空间。

另一方面,新城市女性的出现迎合了全球城市中心服务功能中日益增加的低端岗位需求。正如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学的领导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指出的,低收入职业比如写字楼清洁工、娱乐业服务人员等大多是女性。城市大量低端服务业迅速兴起,包括餐饮、家政、美发美容乃至地下色情服务,大量地由来自农村、未能受过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年轻和中年女性承担。城市中的各类餐饮店、干洗店、美发美容店乃至发廊、洗浴中心、按摩店,也构成了9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街区的常见空间景观^①。

在新城市女性中,还有一部分受雇于工厂,或在其他各类加工及批发交易市场、废旧物资交易市场等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务工。总体而言,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城市女性,大多数分布在对职业技能要求不高的有限就业岗位,其中相当数量的岗位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

^① 黄怡:《性别关系视角下的大都市空间文化嬗变》,《性别文化与妇女发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

五、新城市女性的身份、情感与困扰

新城市女性与城市女性同处在城市生活极其复杂的生态链上,她们在城市空间与社会中的近距离交接,对两个群体双方来说都是富有深意的。城市女性带着些许优越、些许同情、些许钦佩,而来自农村的新城市女性带着些许羡慕、些许嫉妒、些许不屑,她们相互依存,也具备了相互理解对方生存境遇的机会。

新城市女性需要获得城乡身份的转换,首先需要自我的认同。独立、时尚的都市职业女性为新城市女性树立了榜样与模范,无论在职业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她们向往和模仿的对象。尽管条件相距甚远,年轻的新城市女性也会积极地重新塑造自己,努力寻找提升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大城市,注定是一幅呈现出各式各样生存图景的浮世绘,社会多元价值、利益碰撞所引发的问题和矛盾在大城市里集中而尖锐。整体社会氛围加上自身所处窘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城市女性的情感困扰。

失衡的家庭婚恋生活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大量农村人口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虽然给农村的家庭带来了收入,但大多数打工家庭夫妇长期分居。一方面,家里孩子老人要照料,田地要耕种,很多家庭只好选择一人出去打工,一人留守在家;另一方面,也由于户籍、高房价等原因,很多外出农村人口没法拖家带口,不得不和配偶分居两地。夫妻长期分居,生活压力巨大,各自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要均得不到满足,因而在一些打工族家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夫妻”。

固然,城市陌生的环境使得原有的在熟人社会里的伦理道德约束失效;此外,大城市加速上升的离婚率、日趋松散的家庭关系,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迁徙的农村人口的婚姻价值观,使之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在临时夫妻之类松散的性伙伴关系中,新城市女性易于处于弱势地位,道德责备和破坏家庭的风险,使得她们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临时夫妻现象是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婚姻家庭问题,也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与社会整体付出的伤痛代价。

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家庭状况、自我评价等生理、心理及社会多种因素,新城市女性群体在价值取向上也有较大分化。在大城市特定地区、特定空间中,夜总会、发廊、洗浴中心、娱乐中心等不同档次半色情场所趋于实体化、常态化,这里绝大多数是新城市女性的栖身之所。在此现象背后隐含着畸形城市化的深层涵义,它催生了大城市传统家庭价值瓦解的社会焦虑情绪。

对相当多数的新城市女性来说,留守儿童与儿童教育是另一个困扰新城市女性

的问题。据全国妇联统计,我国农村因父母出外打工而产生的留守儿童已有 5 000 多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中所占比例甚至已高达 18%至 22%^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普遍性社会问题。特别是女童遭受性侵问题。2013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女童保护研究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广东省化州市的此类案件被害人中,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占 94%^②。而对携带子女在城市中生活的新城市女性来说,如何能够给她们的子女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是她们最为忧心和关切的大事。

在全球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新城市女性承受了对自我身份认同、情感与价值困惑的巨大心理嬗变,她们也以自身的生存方式对城市的空间与社会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

六、城镇化的未来与新城市女性梦想

我国的城镇化目标,若用女性主义的语言加以阐述,就是当全国 70%~80%的女性能够在城镇就业,能够与城市女性无差别地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制度的好处,能够将子女带在身边生活、就学和照顾,也就是拥有城市生活方式时,意味着中国完成了城镇化。而 20%~30%的女性依然生活在农村,但这只是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差异,而非不得已的抉择,因为城乡是可互为理想的。

也可以这么说,农村女性实现了城镇化,中国也就完成了城镇化,女性的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关键,亦即新城市女性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这需要新城市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为此,有许多努力的切实方向:①提升新城市女性的职业教育,这是改变新生代农村女性命运的突破口,为她们提供适用的、适应城镇化和农村建设需要的职业教育。②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改善新城市女性的就业环境。③营造促进健康的空间环境,包括不断改善的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

在全球化、城镇化交织的复杂而特殊的时代进程中,在社会文化发生的巨变中,不管是新城市女性,还是本来的城市女性,不管是农村农民还是城市知识分子,她们都走在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中国社会梦想的实现取决于女性集体梦想的实现。

① 秦交锋、皮曙初、王研:《“农海归”、农二代、留守儿童——代表委员热议“人的城镇化”三大重点人群》,新华网,2013年3月8日。

② 《留守女童占被性侵人群 94% 妇联建议出台法规》。

海外归国人才就业状况及性别差异分析 ——基于 2011 年上海市侨情调查

吴瑞君 卿石松*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并在国家政策鼓励和人才战略的刺激下,在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海外留学人员纷纷回国就业创业,形成一波又一波“海归潮”。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264.47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109.12 万人。其中,2012 年度与 2011 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留学回国人员增加 8.67 万人,增长了 46.57%,我国已进入智力回流期^①。

在此背景下,海归就业已不如从前那样抢手,女性海归人才的就业压力更大,就业问题突显,“海带(海待)”现象屡见不鲜。国家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他们的科技引领作用,如果他们就业困难,不仅不能起到高端引领作用,还会产生“逆向示范效应”。为此,海外人才归国后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问题,应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深入和系统地开展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就业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上海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目标不断迈进,国际人才高地建设取得成效,海外归国人才越来越多,在上海工作和创业的留学人员约占全国的 1/4。在全国统计数据资源不可获得的制约下,本文利用上海市 2011 年侨

* 吴瑞君、卿石松,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① 参见《中国迎来“智力回流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8 月 3 日第 1 版。

情普查数据,从性别视角展开归国人才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旨在通过这一典型城市的分析发现一些问题,为海外人才,特别是女性高层次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归国人员人口学特征及其性别差异

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市 2011 年侨情调查。该调查标准时点为 2011 年 6 月 1 日零时,调查的对象是在上海市居住半年以上(包括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的归国华侨、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居民、留学生及其眷(亲)属。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业类型等。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 16 至 60 岁的海外归国人员(包括归国华侨和归国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不包括此年龄段在校学生和离退休人员。总样本量为 12 098,其中女性样本为 5 511,占 45.55%。

(一) 归国人数不断上升并具有年轻化趋势,学历层次较高

为加快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尤其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海外人才优惠政策^①,吸引海外人才来沪就业创业已初见成效。从图 1 海外人员归国变化趋势的数据表明,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近 5 年,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归国人数和比重急剧上升。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归国人员相对较少,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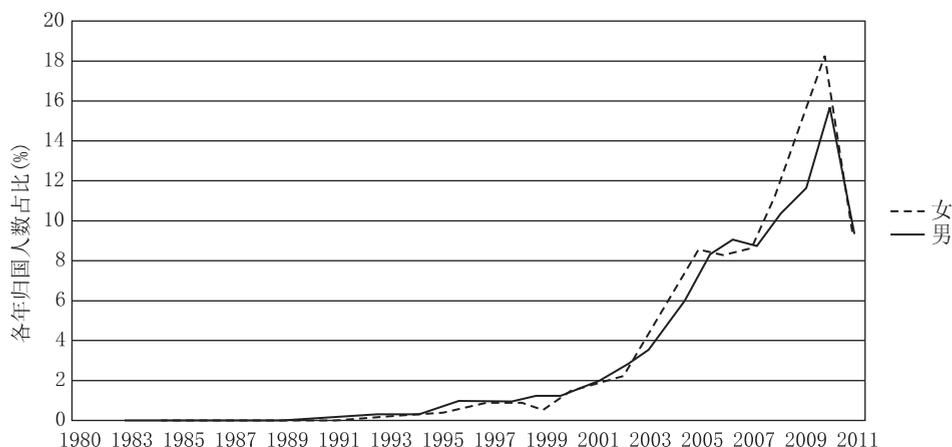


图 1 历年归国人数比重变化趋势(%)

^① 包括上海市于 2003 年启动实施的“万名海外留学人才集聚工程”和 2008 年实施“浦江人才计划”等,以便吸引优秀海外人才来沪工作和创业。

94%的人都是2000年以后归国的。分年度看,归国女性人数逐年增加,从2000年到2010年末,年均增长率近30%。其中,2008年女性归国人数为603名,占全部女性归国人员的11.24%。此后两年持续增加,2010年达到979人。^①此外,归国人员具有年轻化趋势。以女性为例,女性归国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2.29岁。其中,1984年女性归国人员的平均年龄为58岁,2000年下降到42岁,2011年下降到27岁。也就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国就业或创业,很多一部分是刚刚学成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

海外归国人员学历层次较高,全部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其中,大学本科学历人口比重为36.6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58.37%,只有4.98%为大专学历。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的学历层次略高于男性,男性和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分别为94.49%和95.65%。其中,男女本科学历人口比重分别为37.29%和35.89%,男女研究生学历层次的比重分别为57.19%和59.77%。

(二) 浦东新区、长宁区和闵行区等是上海归国人员的积聚地

从图2海外归国人员的区域分布来看,浦东吸纳归国女性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的16.35%,最少是崇明,不到0.5%。同时,长宁、徐汇、普陀、虹口和杨浦等传统中心城区仍然是海归女性聚集重镇。闵行作为郊区中的后起之秀,在吸引归国女性方面排名第三,仅次于浦东和传统中心城区长宁,吸纳了10.71%的女性海外归国人员。这一点与“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境外人员的主要分布于浦东、长宁和闵行的现象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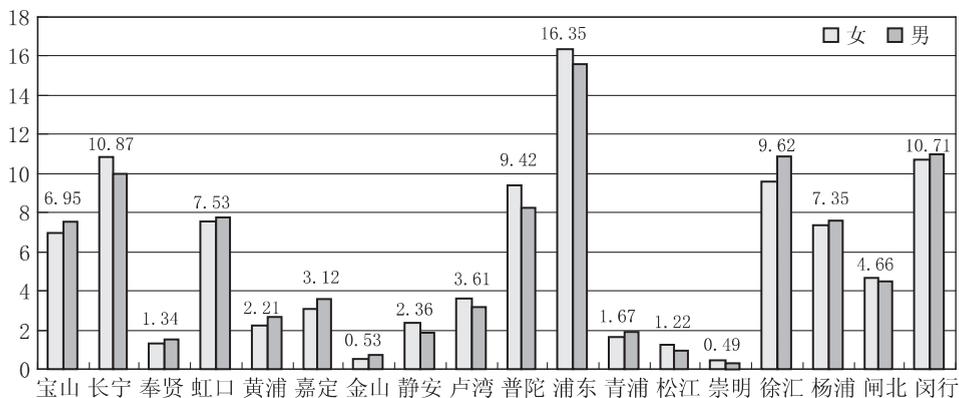


图2 上海市海外归国人员区域分布(%)

^① 由于调查时间的起点为年中(6月1日),2011年调查得到的归国人数仅为509人,但超过2010年全年海外归国人数的一半。因此,很难说2011年归国人数出现下降。